

论作为道德义务的“公民不服从”问题

沈克非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 400031)

【内容摘要】本文阐述了合法权威与道德自主的悖论,分析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问题,并最终在法理范畴推断出道德上的公民不服从与法律体系本身的自治,最终认为,公民不服从,不仅是公民的道德义务,更应当为法律体系结构本身所包容,任何人都不应当以法律或者其他原因为借口,从而放弃道德自律。

【关键词】道德自主 合法权威 政治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D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2)02-0074-02

在雨果·亚当·比多的《公民不服从》中认为:“公民不服从”思想三个最有影响的根源是苏格拉底、梭罗和马丁·路德·金,但苏格拉底是讲为什么应当服从一个不公正的法律,而后两人则是讲为什么应当不服从。^{[1]P1}鉴于此,笔者想从梭罗的名著《论公民的不服从义务》(on the duty of civil disobedience)开始,解析公民不服从的哲学内涵,并开始这场新的论辩。

一、哲理之辩:合法权威与道德自主的悖论

梭罗在其《论公民不服从的义务》一文中提出,假设在政府里不靠多数人,而是用良知来判断是非,多数人只决定政府该管或不该管的问题,这样的政府是否是可能的?难道一个公民永远应当在特定时刻,或在最低程度上迫使他的良心服从立法者吗?如果这样,人们要良心又有何用?

梭罗在这里谈及的问题,可以转化为政治哲学上的一个探讨,就是沃尔夫在其《为无政府主义申辩》一书中提出的合法权威与道德自主冲突的“权威悖论”。在沃尔夫看来,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就是在什么条件下政府的合法性能得到正当化证明,而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使个人的道德自律(这是康德伦理学理论的主要特征)与被马克斯·韦伯视为政府标志的权威主张相协调的问题。”^{[2]P5}这也正契合了梭罗所提出的“我们首先应该是人,其次才是臣民。”梭罗认为,仅仅为了公正而培养尊敬法律的习惯是不可取的。“我有权承担的惟一义务就是在任何时候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所有的人都承认革命的权利,那就是当人们无法容忍一个独裁或无能的政府时,拒绝效忠并抵抗它的权力。因为一个人没有责任一定要致力于纠正某种谬误,哪怕是最不公正的谬误,他仍可以适当地从事其他事情。但他起码有责任同这谬误一刀两断。”^[3]也就是说,在梭罗看来,政府的权威并不能成为公民放弃道德自主而服从的行为理由。

而在沃尔夫那里,首先区分了权威与权力。“权威是发布命令的权利以及与此相关的得到服从(obedience)的权利”,而权力是指“通过运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来强迫他

人遵从(compliance)的能力。”拥有权力,是指运用强制力或以强制力相威胁来强迫他人遵从的能力,而权威是发布命令的权利以及要求服从的权利,或者说拥有统治的权利。在沃尔夫的概念中,权威被界定为一种权利而非权力,是指发布命令并得到服从的权利,即“主张得到服从的权利”。^{[2]P2-3}权威的权利与权力之区别在于,后者是指通过运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来强迫他人遵从的能力。主张权威就是主张得到服从的权利。

同时,沃尔夫也区分了具有权威性的命令与具有说服力的论证。“当有人命令我去做一件事情时,即使我没有受到威胁我也可能会选择遵从,因为我被说服去相信这件事是我应该做的”,在此种情境下,人们是在对一个论证的效力或者一个指示的正当性的承认,但不能说这个论证具有权威,遵从这样的说法并不等于承认了论证的任何权威。在这种情形下,严格地说,虽然人们选择了遵从,但却不是在服从一个命令,命令者对其而言不拥有权威。因为服从权威与去做某人吩咐之事并不是一回事。

在区分了上述概念之后,沃尔夫提出了关于道德自律的问题。人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这是道德哲学最基本的假设。人是自由而理性的。自由意味着人们可以对行动做出选择,理性则是人们做出最佳选择的能力。人的这种本性给人们设定了一项道德义务:即每一个人都必须运用自己的理性去选择最佳行为理由,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当人们尽了这项道德义务,他就是一个道德自主的人。

权威是要求服从的权利,其要求的是服从权威的形式,而不论其内容如何。而自律要求对内容的考量,即怎样做是符合道德义务的。这就是权威悖论:权威要求服从,而不会命令的内容。道德自主要求个人关注命令的内容,不得因为它是权威的命令而服从。沃尔夫简洁而有力地表达了这一冲突的性质:“政府的确定性标志是权威,即统治的权利。人的首要义务是自主,即对被统治的拒绝”。^{[2]P10}沃尔夫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这种演绎说明,合法权威的概念与道

* 作者简介:沈克非(1983—),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理论专业2009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法哲学。

德自主在逻辑上是不相容的,从而否定合法性信念本身的道德上的合法性。

通过沃尔夫的演绎,我们可以看到,从道德层面探讨公民的不服从是基础的条件,公民不服从的基础是道德的自律,而政府的统治显然在道德合法性上并非是先验的,是必须加以证明的。当然,这里的探讨的政府,是具有合法的事实权威的政府,是符合罗尔斯界定的公民不服从之前提条件的政府。

如梭罗所言,政府的权威,甚至是“我甘愿顺从的权威,——因为我乐于服从那些懂得比我多、干得比我好的人,甚至在许多事情上服从那些懂得和干得都不如我的人,——仍然是不够纯洁的。严格说来,它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承认和同意。”

二、规则之辩:合法性统治与赞同

梭罗对待法律的立场是:制定的规则,并不是如功利主义的学者所言的,是人们“小心遵守,奋力批驳”的对象,更不能成为人们行为的唯一排他性理由,而是要从个人的正义和良知出发,作出自己的判断。人们遵守法律,是因为法律是正义的,一旦法律是非正义的,则人们不能仅仅满足于一边修正,一边服从,而是应当立即就反抗。当然,他倡导的反抗,是一种非暴力的方式,即公民不服从的方式。

事实上,法律规则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社会存在的基础这一问题也是值得探讨的。自远古以来,人们可以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管理好他们自己。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把强制力依赖为解决利益冲突的途径。即使是处于强制之下时,人们仍然保有自主行动,进行选择和享有自由的能力,然而当强制力被使用时,这些体现人之主观特性的东西就会遭到摧毁。强制力将会使胜利者和受害者非人性化。因此,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对强制力之滥用,会损害每个个人的合法存在。^{[4][P6]}

如果从规则层面来看合法性的统治,可以发现,合法性需要对规范的重视,合法性的条件之一,就是对于政府的活动应该、为何取得谅解。政治究竟应该将何种价值作为自己所推动的目标,处于统治地位和处于服从地位的人,应该就这一点达成一致,也只有在这个时候,统治才成为一种权利行为。^{[5][16]}

那么可以进行一种演绎,即规则是通过民主的程序制定的,而统治正是依据这种规则进行,于是统治可以被视为已经获得了赞同,这样的统治是合法的。乍看之下,这样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但是,作为这个推演的前提条件却并非绝对稳固的。民主程序,除非是全体一致的直接民主,才可能构成这个演绎的不可动摇的前提,而在现实宪政之中,这种民主制度只能通过不断的改进代议制民主的方式而接近,但不可能完全实现,于是,演绎的基础将不可避免的产生缝隙,即多数人同意情况下的对少数人的强迫。

尤其是,当这种强迫披上了公共政策等外衣,并以国家强力作为推行手段的时候,对于少数人而言,就是在被强迫,他们被统治,却并未取得他们的赞同。赞同之所以在合法性的建立中起到作用,正是因为,它在构成普遍意义上的权利与构成特别意义上的政治权利的这种相互关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如果统治者尊重共同体成员的权利并完成他们的特别义务,那么个体就会为了政治机构的利益而放弃他们的部分行为能力。换句话说,他们承认政治机构的统治权利。只要存在着赞同,那么对权力与权利的同性的判断就将一直延

续下去。如果这种赞同被收回,那么这将构成政治缺乏合法性的标志。公民的赞同,是统治权利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事实上,虽然政治合法性使得处于指挥地位的个体和处于服从地位的个体之间的这种关系具有效力,但是它却并不只能建立在像刚刚被论述的那种赞同的基础之上。

在极端情况下,非暴力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即使不是政府的一种权利的话,也可以是它对其公民的一个义务。^{[6][P15]}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比如影片中的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即这种规则有违人的良知时,则规则之下被压迫的人们必然将要面对选择。梭罗说,“我来到这世界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将它建成生活的乐园,而是在此地生活,无论它好还是坏。一个人不必样样事都去做,而只需做一些事。正因为他不能样样事都做,他就不应该将一些事做错。”^[7]

规则创造了一个空间,人们也许可以称其为“获得许可的非暴力不服从”。要想堵住任何漏洞,规则的最典型特点就是过度包括。但是,过度包括可能的结果就是成为形同虚设的条文,变成仅是说说而已的东西。因此,在实践中,有许多规则违反,包括违反法律规则,都被容忍了,甚至被认同了,尽管通常是默默地,为的是保存该规则。结果是,有一类犯罪行为尽管不被原谅,却还是许可了。这是政府长期采用的一种设置,不应嘲笑。^{[6][P158]}

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成熟和完善的法律体系,都是允许公民不服从的存在的。当然,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罗尔斯所确立的不服从的存在基础,即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法律体系虽然是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但其始终都只是为了使社会生活更加美好的一种手段,法律的确在为公民提供一种选择的方式,但其自身并不是选择。

结语

事实上,任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都仅仅是手段,从来不是目的。“当我们遭遇严酷的法律思想的拷问和道德情感的历险,任何法哲学流派的划分和彼此之间的论争早已不再重要,因为任何一个流派的思想立场未必就是不可动摇的,其核心观点也未必就是论证缜密而不可质疑的。”^[7]人以及人的幸福,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才是终极的目的。综观20世纪的法学争鸣,事实上,所有的观点都不是完美和无懈可击的,一切哲学争论,只不过是其自身对于如何达成终极目的而做的一个解答而已。在面对法律和道德的双重诘问的时候,没有人能完美的做出解释。但是,我们至少应当保有选择的权利,并一直努力去做出正确的选择。

参考文献:

- [1]何怀宏编.论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 [2][美]JR.沃尔夫.甘会斌校,毛兴贵译.为无政府主义申辩[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 [3]Henry David Thoreau: On The Duty Of Civil Disobedience. Black Mask Online.1999.
- [4][英]约翰·霍夫曼.陆彬译.主权[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 [5][法]让-马克·夸克.佟心平,王远飞译.合法性与政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 [6][美]理查德·波斯纳.苏力译.并非自杀契约——国家紧急状态时期的宪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7][美]萨伯.陈福勇,张世泰译.洞穴奇案[M].北京:三联书店,2009,导读部分.